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现代  
世界体系的  
混沌  
与治理

Giovanni Arrig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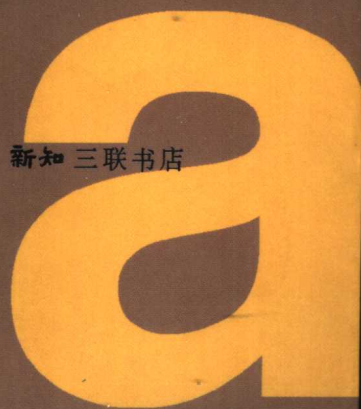
Beverly J. Silver

乔万尼·阿瑞吉

贝弗里·J·西尔弗 等著

王宇洁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学术前沿

THE FRONTIERS OF ACADEMIA

现代世界体系的  
混沌与治理

乔万尼·阿瑞吉 贝弗里·J·西尔弗等 著

王宇洁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Chaos and Governance in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Giovanni Arrighi and Beverly J. Silver etc.

Copyright 1999 by the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明尼苏达大学授权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美)阿瑞吉等著;王  
宇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  
(学术前沿)

ISBN 7-108-01762-8

I. 现… II. ①阿… ②王… III. 国际政治-研究  
IV.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9842 号

**责任编辑** 舒 炜 冯金红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 数** 273 千字 图字 01-2001-2345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 学术前沿

## 总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素来重视国外学术思想的引介工作,以为颇有助于中国自身思想文化的发展。自80年代中期以来,幸赖著译界和读书界朋友鼎力襄助,我店陆续刊行综合性文库及专题性译丛若干套,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良好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格局的急速变化,学术思想的处境日趋复杂,各种既有的学术范式正遭受严重挑战,而学术研究与社会—文化变迁的相关性则日益凸显。中国社会自70年代末期起,进入了全面转型的急速变迁过程,中国学术既是对这一变迁的体现,也参与了这一变迁。迄今为止,这一体现和参与都还有待拓宽和深化。由此,为丰富汉语学术思想资源,我们在整理近现代学术成就、大力推动国内学人新创性著述的同时,积极筹划介绍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国外著作。“学术前沿”丛书,旨在译介“二战”结束以来,尤其是本世纪60年代之后国外学术界的前沿性著作(亦含少量“二战”前即问世,但在战后才引起普遍重视的作品),以期促进中国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反思,并回应当代学术前沿中的重大难题。

“学术前沿”丛书启动之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而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历经百余年艰难曲折,正迎来一个有望获得创造性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我们愿一如既往,为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建设竭尽绵薄。谨序。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11月

献给 特伦斯·K·霍普金斯(1928—1997)  
朋友、导师和共同策划人

## 前言与致谢

本书的写作源于“世界体系中的霸权与对抗：地缘政治结盟的趋势与前景，1500—2025”这一研究项目。此项目由约翰·D·暨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John D. and Catherine T. MacArthur Foundation)赞助。工作的一半由霍普金斯(Terence K. Hopkins)和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协调，集中论述1945年以来世界体系的轨迹。研究成果就是霍普金斯和沃勒斯坦等人的著作《转变的时代：世界体系的轨迹 1945—2025》(*The Age of Transition: Trajectory of the World-System 1945—2025* (London: Zed Books, 1996))。

我们这一半项目对目前的全球不稳定时期和早先的两个时期(我们认为它们是类似的)进行对比,它们是18世纪霸权从荷兰向英国的转移,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霸权从英国向美国的转移。我们非常感谢麦克阿瑟基金会,尤其感谢本尼迪克特(Kennette Benedict)认可了这个论题:为了理解当代社会的困境,我们不得不对几个世纪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进行考察。

这本书是近十年工作的成果。最初的概念形成和大部分研究工作都是宾厄姆顿大学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文明研究中心比较霸权研究工作组(Comparative Hegemonies Research Working Group of the Fernand Braude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conomies, Historical Systems, Civilizations of Binghamton

University)完成的。研究工作组的成员斯蒂文·舍曼(Steve Sherman)也参与了本书的写作,他写作了关于文化的一章,与此项目关系紧密。由于编辑上的原因,这一章已经以“霸权的转移与文化变迁的动力学”(“*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the Dynamics of Cultural Change*”)为题单独发表于《评论》(22卷,第1期,1999年冬季号)(*Review 22, no 1 (winter 1999)*)。

1993年4月,我们曾邀请一些学者到宾厄姆顿大学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就本书的草稿征询意见。他们的意见和批评使我们对这本书进行了实质性的结构调整、扩充和改写。对这些学者的积极参与我们深表感谢,他们是 Nicole Bousquet、Harriet Friedmann、Victoria de Grazia、Lars Mjøset、Frances Moulder、Ravi Palat、Frances Fox Piven、Mark Selden、Peter Taylor 以及 Immanuel Wallerstein。

四年之后,我们将研究成果提交给 Craig Calhoun,作为“现代性的矛盾丛书”中的一本。他和 Bruce Fuller、Micah Kleit 的意见非常有帮助,1997年我们又作了进一步的重大修改,特别是完全重写了导言和结论。我们感谢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编辑人员能干和高效的工作,在他们的指导下,此书得以出版。我们还要感谢布罗代尔中心的 Donna DeVoist,她的帮助对这个项目的完成至关重要。

这本书题献给已故的霍普金斯。作为霸权研究工作组的协调者之一,他对研究计划的制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洞见与慷慨在他身上融为一体,他对各章初稿提出的意见,在本书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他是宾厄姆顿社会学研究生项目的同事、导师、创建者和指导者,他对几代学者和研究生产生的深刻影响是难以衡量的。我们希望此书堪为对他的纪念。

# 目 录

前言与致谢 .....	1
导论 .....	阿瑞吉、西尔弗 1
第一章 地缘政治与巨额 融资 .....	阿瑞吉、许宝强、瑞、莱弗 43
第二章 商业企业的 转型 .....	阿瑞吉、巴尔、久枝秀次 108
第三章 世界霸权的社会根源 .....	西尔弗、斯莱特 164
第四章 从世界历史角度看西方 霸权 .....	阿瑞吉、艾哈迈德、石敏文 236
结语 .....	阿瑞吉、西尔弗 296
参考文献 .....	317
译名对照表 .....	377



# 导 论

阿瑞吉(Ciovanni Arrighi)、

西尔弗(Beverly J. Silver)

构成现代世界的历史社会体系,其大部分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称作“普遍危机或全球危机的时代”,他所谓短暂的20世纪(1914—1991)的结束阶段。在他看来,苏东共产主义政权的崩溃“产生了一个政治变幻、不稳定、混乱和内战的广阔地带”。更糟的是,它“还摧毁了……四十多年来稳定的国际关系体系,……并且揭露了本来依赖于这种稳定的国内政治体系的不稳定性”。(1994,9—10)

政治的基本单位,建立在领土基础上的、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包括那些最古老、最稳定的国家,都发现自己被超国家或跨国家的经济力量,被分离主义地区和族群的次国家力量撕裂。一些力量要求拥有过时和虚幻的微缩主权的“民族国家”地位,这正是历史的嘲弄。政治的未来并不明朗,但在**短暂的20世纪**的末尾,它的危机是明显的。(Hobsbawm,1994,10—11)

同样明显的是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信念的危机,还有“自从

18世纪早期现代人战胜了古代人、赢得了这场著名的战役以来,现代社会所赖以建立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危机。(Hobsbawm,1994,11)同样,沃勒斯坦宣称,1989年标志着“一个政治—文化时代——一个壮观的技术成就时代的终结,正是在这个时代里,大多数人看到法国大革命的口号反映了不可避免的历史事实,它们将会在现在或不远的将来成为现实”。和霍布斯鲍姆一样,沃勒斯坦也把1989年的巨变放在前二十年愈演愈烈的无序背景中来考虑。但与霍布斯鲍姆不同的是,他把这种无序解释为体系混乱的一种形式,这种混乱是由这样一个事实造成的,即“制度的矛盾到达了这样一点,在这里,任何恢复制度正常功能的机制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Wallerstein,1995a,268)

如上所述,当前的危机被用来标示一种结束,不仅是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发起的特殊政治—文化时代的结束,而且是从“漫长的”16世纪以来就存在的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束。“正如在五个世纪以前的欧洲,[现代世界体系]显露了‘封建主义危机’的终结一样,这一现在覆盖全球、不断取得科技成就的历史体系,处在体系危机之中”(Wallerstein,1982,II)。罗西瑙(James Rosenau)从不同的前提出发,也赞同这一看法。他认为,几个世纪以来规定国际体系中的行动的要素,今天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像相似的变化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达到顶点,给世界政治带来第一次混乱。”(Rosenau,1990,10)

冷战时代、长一些的“自由主义”和启蒙时代,或是更长一些的民族国家体系时代,不论认为它们哪个在走向终结,我们都可以看到不确定性在吞没现在和可预测的未来。霍布斯鲍姆说(1994,558—59):“当时代末尾的公民笼罩在迷雾中,探着路走

向第三个千年时,所有人都肯定知道一个历史时代已经结束,但除此之外,他们几乎一无所知。”

有些人甚至认为,终结的不是一个时代,而是历史本身。他们认为不是在危机中终结,而是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胜利中终结。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称,随着苏东共产主义的崩溃,“自由主义民主依然是惟一一致的热望,它跨越全球不同的地区和文化。”两代人以前,“许多理性的人能够预见到一个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的未来,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都被废除……相反,在今天,我们很难想像一个比我们现有的好出许多的世界,或是一个本质上不是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世界。”(1992, xiii, 46)

这一宣言是在里根政府的国务院中构思的,它最初的版本(Fukuyama, 1989)立刻得到了回应,并在“世界新秩序”的幻象中应用了起来,那是布什总统面临萨达姆·侯赛因入侵科威特的问题时提出的。海湾战争中美国/联合国的大获全胜不由使人相信,一个世界新秩序正在形成。不过,用霍尔(John A. Hall)的话来说,这个观点很快成为一个“令人厌恶的笑话”,因为种族暴力在不断扩大和升级。澳大利亚历史学家贝尼(Geoffrey Bainey)有一句格言叫做“乐观主义总是战争的前奏”,这句话再次被事实证实(Hall, 1996, xii)

## 关于世界政治经济前景的四个争论

现代世界更早的两个转移时期中体系变化的动力学,在主要方面都与现在的转移相似,本书对其进行考察,目的在于至少部分地驱散笼罩我们的“全球迷雾”。如果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现在是美国世界霸权衰落和危机的时期,那么也可用先前世

界霸权转移的两个时期对之进行类推。这两个时期是：18 世纪世界霸权从荷兰向英国转移，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世界霸权从英国向美国转移。对已经完成了的这两次转移的异同进行比较，目前这次转移的变化必然彰显。

我们的研究由四个互相关联的争论构成。第一个是国家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特别是是否可能出现一个新的霸权国家。第二个涉及国家和商业组织之间的力量平衡，特别是“全球化”是否已经不可救药地毁坏了国家的权力。第三个涉及次一级组织的权力，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是否已经处在一个无法停止的“向谷底冲去的竞赛”之中。第四个涉及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不断变化的力量平衡，特别是西方主宰现代世界体系的五个多世纪是否已到了尽头。

每一章都会带着这四个问题中的一个，对过去的两次霸权转移进行分析。因此，我们首先应对目前引发我们考察过去的四个争论进行比较详细的说明。在这个导言的第二部分，我们将对这项研究所基于的中心概念和理论框架作一阐明。在结论部分，我们将用考察过去得出的新见解对这四个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论述。

## 世界强国的地理分布

是否有一个新的世界霸权国家正在出现，如果出现，那么又会将是哪个国家，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正如吉尔平 (Robert Gilpin) (1996, 2) 注意到的：“如果冷战真有胜利者的话，究竟是谁，对此并无一致意见。”一些分析家分别认为胜利者是美国、统一的欧洲、日本，而另外一些则认为，相对于超国家的经济和政

治组织,所有的国家都失去了权力。

随着美国的对手苏联的崩溃,对美国全球力量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

“现在是一个单极的时刻”,一个持胜利主义论调的评论家洋洋得意地说。“只存在一个一流的力量,暂时还看不到会有其他力量可与它对抗。”但是,一个资深美国外交政策官员反对说:“我们完全没有优势,我们没有影响,没有运用武力的倾向。我们没有钱制造那种压力,那种能随时迅速产生积极效果的压力。”(Ruggie,1994,553)

如果美国没有优势、没有影响、没有钱制造那种产生积极效果的压力,那么谁有?这个问题同样没有一致的答案。1992年,瑟罗(Lester Thurow)预言,1993年1月1日成立的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标志着新的经济竞赛开始,它取代了过去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竞赛。在新竞赛中,“作为最大的市场,欧洲议会将写下21世纪的市场贸易规则,世界的其他部分将不得不学着遵循它们的规则进行经济游戏。”(1992,24—25;同样的评价,见Burstein,1991,11—12)

而且,随着1993年1月的到来,欧洲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马丁·雅克(Martin Jaques)在伦敦的《星期天泰晤士报》(*Sunday Times*)上把欧洲描述为“一个衰落的大陆”,它“必须把自己调整到一个不那么高的位置上”(引自Dicken and Oberg,1996,102)。四年之后,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似乎证实了一种更悲观的观点。

欧洲遇到极大的结构性经济问题,从 20% 的年轻人失业,到供养老年人口的费用逐渐增加,选择此时统一货币真是不能再糟了。最好的情况是,对货币一体化的政治引导会分散注意力,延误欧洲在世界经济中更具竞争力所必需的剧烈变化。最差情况是,如果使用欧元后经济情况很快恶化,反对一体化的政治呼声高涨,欧洲统一的整体事业将遭受挫折。(Passell, 1997, D2)

日本世界力量的分量同样也不是很清楚。七国集团在 1985 年普拉扎会议启动日元对美元汇率调高,也就是苏联崩溃前不久,日本的政治影响似乎达到了顶峰。升值的目的是为了控制美国的贸易赤字,结果却导致全球金融和房地产市场中“日本货币”表面上不可抗拒的上升。日本银行开始在国际资产等级中位居前列,日本集团投资者踏入了美国国债市场。“在华尔街和伦敦城,在全球最佳研究生院的研讨会目录上,都出现了一个无人能够忽视的自信的新力量。”(Nakao, 1995, I)这个新力量收购了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美国资产,比如洛克菲勒中心、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西雅图 Mariners,以及洛杉矶市区的许多地方,在美国出现了“黑色的警示,警告美国未来的决策将会在日本做出,而不是在纽约和华盛顿”。(Sanger, 1997a)早些时候的那些预言,比如“超级大国日本出现”(Kahn, 1970),或“日本位居第一”(Vogel, 1979),看来说到点子上了。

不过在短短七年后,这些“黑色的警示”看起来“几近可笑”。日本“几乎未能控制它[在美国]收购的东西”,而且“大多数投资遭受了巨大的损失”(Sanger, 1997a)。由于汇率的变动,日本海外投资的损失甚至还要更大(Hale, 1995, 148)。部分由于这些

损失,1990年初东京股市暴跌,到1992年底,几乎跌去了55% (*Japan Almanac*,1997)。在1990年的暴跌之后不久,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海湾危机,暴露了日本政治方面的虚弱。甚至到1991年初战争爆发时,日本政府都不能采取一个独立的方针,而是再次跟随在美国之后。看来日本是一个头号经济大国,但在政治上处于三等地位。(Nakao, 1995,1)

在后冷战时期找出一个确实“强大的国家”是困难的,一些分析家由此认为,在激烈的经济一体化的冲击下,所有国家的权力都在衰落。这是本书集中考虑的第二个问题。

### 国家权力对资本权力

在重新开始的国家与资本主义关系的争论中,许多人最初就不同意金德尔博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一个主张,他认为跨国公司体系既不拥有忠诚,也不拥有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归属感,由于它的出现,“作为经济单位的民族国家已经到头”(1969,297;又见 Hymer and Rowthorn, 1970, 88—91; Vernon, 1971; Barnet and Muller, 1974, 15—16; Sklar, 1976)。不过大约二十年后,国家由于超国家经济力量而普遍失去权力这一论题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广为盛行(尤见, Dicken, 1992; Ohmae, 1990; Sklair, 1991; Reich, 1992; Barnet and Cavanagh, 1994; Horsman and Marshall, 1994; Waters, 1995)。这些年里,多国公司拓展海外活动,引发了全球金融扩张和一体化,一体化获得了

自己的动力,这成为全球化论题倡导者宝库中最强有力的证据。

就伯格斯特(Fred Bergsten)看来,到1995年七国集团召开哈利法克斯会议之际,“大量的私人资本[已]威胁官方不能采取任何努力去反对它们。”彼得森(Eric Peterson)引用了伯格斯特的论述,之后又怀疑地说这些资本究竟是否能够被反对,并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全球市场霸权”。随着“全球资本竞争”的激化,即使在最大的国家中,包括美国,反地方主义的市场力量(主要是一些商业组织,但也有一些个人)也会对经济政策设置更多更严密的约束。“它们还会对美国在海外实施有效的安全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能力产生影响,决定华盛顿能够在何种程度上维持自己世界领袖的角色。”(Peterson,1995,111—13)

再回到我们争论的第一个问题,全球化主题的倡导者认为并没有一个国家或是一组国家在冷战中真正获胜,因为流动资本不忠诚于任一特定国家,其所有者才是赢家。在后来的形势下,信用评估机构,比如穆迪投资(Moody's Investors Service)很有影响,某些评论家甚至把它与军事超级大国拥有的影响相提并论。墨西哥债券的下跌加速了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夸张地评论说,我们可能再次生活在两极世界:“一极是美国,一极是穆迪。美国能够扔炸弹把一个国家夷为平地,而穆迪可以贬低它的债券把它毁掉。”(引自Cohen,1996,282)

在全球化过程中,相对于非地区、超国家或是跨国经济力量,国家普遍丧失了权力,这一观点即使以不太过火的形式出现,也受到了挑战。跨国流动的资本速度和资本数量不断增长,几乎无人对此质疑。但是认为这一增长构成国家—资本关系中一个新的或不可逆转的发展,却受到很多质疑。



一些批评家指出,国家积极参与了对金融市场进行一体化、放松管制的过程,过去这一市场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并受政府的管制。而且,这一积极的参与是在最小国家(minimalist state)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的保护下出现的,某些国家(最著名的是撒切尔时代的英国和里根时代的美国)本身对此也进行了宣传。既然国家的支持和鼓励对全球化的进程不可或缺,那么国家就具有逆转这一进程的力量,如果它决定如此的话(各种批评见 Block, 1990; Sobel, 1994; Helleiner, 1994, 1997; Hirst and Thompson, 1992; Weiss, 1997)。

毋庸置疑,即使全球化起源于国家行为,但它可能已经获得了一种动量,由于投入的费用,国家不可能或不希望逆转(Goodman and Pauly, 1993; Pauly, 1995)。不过,对于全球化的程度、它是否可逆转、是否限制了国家行为,分析家们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Cohen, 1996, 280—93)。有人甚至认为全球化是未来美国拥有更大权力的同义语。确实,随着苏联的崩溃,美国化表面上在全球胜利,它的各个方面本身就被视为全球化的迹象。最广为人知的迹象就是美国流行文化的全球霸权,以及主要受美国及其亲密盟友影响的世界治理机构重要性的不断增长,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北约、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不那么广为人知、但是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在国际商业交易中,一种被美国律师事务所和英美商法概念支配的新的法律体制占据着优势(Sassen, 1996, 12—21; 又见 Gill, 1990; Sklair, 1991)。

全球化使国家失去力量,这一论题也受到了另外一些批评家的挑战,他们关注的是这一现象长期的方面,并从国家—资本关系近来所谓的新奇变化中看到了许多似曾相识之处。沃勒斯